



郭沫若

研究三十年



中国郭沫若研究会 编
郭沫若纪念馆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郭沫若 研究三十年

中国郭沫若研究会 编
郭沫若纪念馆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郭沫若研究三十年/中国郭沫若研究会,郭沫若纪念馆编.
—成都:巴蜀书社,2010.1
ISBN 978-7-80752-545-5

I. ①郭… II. ①中… ②郭… III. ①郭沫若(1892~1978) - 人物研究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4280 号

郭沫若研究三十年

中国郭沫若研究会 编
郭沫若纪念馆

责任编辑	李 蓓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028)84122206
照 排	成都完美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0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148mm
印 张	12.875
字 数	300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545-5
定 价	2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目 录

郭沫若史学研究三十年	谢保成 (1)
关于郭沫若文献史料工作的回顾与思考	蔡 震 (17)
郭沫若研究三十年与郭沫若传统	颜同林 (30)
对《十批判书》的评价与争议之回顾与认识	张 越 (43)
新时期三十年《女神》研究回顾	钱晓宇 (59)

《十批判书》中的儒学研究

——学术史视阈中的郭沫若	彭邦本 (73)
论郭沫若在历史研究中的民族思想	翟清福 (88)
郭沫若《金文所无考》补正	冯 时 (95)
郭沫若西周金文修辞研究及意义管见	李义海 (104)
郭沫若与新中国初期的历史教育	尤学工 (116)
二十年：我与郭沫若研究工作	杨胜宽 (135)

文学革命：“第二阶段”的独立意义

——重评郭沫若《创造十年》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李 怡 (145)
论郭沫若创作的空域背景	朱寿桐 (161)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论争缘起研究的回顾与重探 ...	咸立强 (175)

泰戈尔究竟怎样影响了郭沫若	魏 建 (189)
也谈“郭沫若对鲁迅态度剧变之谜”	廖久明 (203)
论《女神》的民族色彩	张中良 (218)
郭沫若与闻一多之诗文化比较	郝明工 (232)
沫若《女神》与毛泽东诗词 ——中国现代诗歌主体精神建构的一种模式 ...	陈晓春 (258)
民族精神家园的建构 ——郭沫若 1936 年以来的诗文分析	张武军 (271)
20 世纪 40 年代的郭沫若及其抗战历史剧	贾振勇 (286)
略论郭沫若的历史剧《武则天》	张剑平 (308)
论郭沫若的序跋	彭林祥 (324)
郭沫若与服饰文化初探	张志春 (338)
论郭沫若的文艺大众化思想	张传敏 (350)
欲望的身体与分裂的自我 ——以郭沫若的小说为例	魏红珊 (362)
作为生命救赎形式的自叙传小说 ——论郭沫若早期小说	肖伟胜 (375)
晚年郭沫若的诗墨情怀和行旅书写 ——以郭沫若与古都西安为中心的考察	钱克兴 李继凯 (389)
学术研讨会综述	梁雪松 整理 (404)
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	(409)
编后记	(410)

郭沫若史学研究三十年

谢保成

郭沫若离世距今整整 30 年了，现就所了解的郭沫若史学研究作一回顾。

—

郭沫若离世的最初一二年，以回忆、纪念性文章为多。1982 年郭沫若诞辰 90 周年之际，中国史学会召开纪念学术报告会，成为研究郭沫若史学的契机。刘大年《学习郭老》将郭沫若比作“一部百科全书”，称其为“社会主义的司马迁”。尹达《郭沫若所走道路及其杰出的学术贡献》、《郭沫若与古代社会研究》认定郭沫若“集科学家、革命家于一身，学术研究与革命活动兼而为之”，“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发展史上，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功绩”，同时表示自己“在治学的精神上，已成为郭老的私淑弟子”。黄烈《郭沫若在史学上的贡献》对郭沫若史学研究第一次作出系统

评述，分五个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创立及其所树立的优良学风、古史分期问题对史学发展的推进、甲骨金文研究在史学上的运用、古代思想史研究的贡献、古籍整理上的贡献。方诗铭、刘修明《“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从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占有和研究大量第一手材料、有着明确革命目标三个方面论述郭沫若所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特点及现实意义。

在纪念、回忆、评述的同时，在古代史分期、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上出现了争鸣。古代史分期，继续 20 世纪 20 年代末到 70 年代末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论争。金景芳《中国古史分期商榷》从八个方面对郭沫若的殷周奴隶社会说和战国封建社会说提出商榷。杨公骥《评郭沫若同志的〈奴隶制时代〉》就郭沫若关于西周、春秋时期奴隶经济与政治地位的论述提出七点非议。邓廷爵《关于我国古史分期的标准问题》、赵倬生《有关井田制的辨析》等都对郭沫若战国封建说表示出不同意见。田居俭《立一派学说，促百家争鸣》论述如何看待郭沫若的分期主张和《奴隶制时代》一书。侯绍庄《怎样理解郭沫若同志的古史分期学说》针对金景芳等的观点进行反驳。历史人物评价，主要集中在对曹操、武则天、李白与杜甫的评价方面，关于李、杜的评述仅限于文学评论。

关于《甲申三百年祭》的争论由姚雪垠《论〈圆圆曲〉》开始，其代表文章为《评〈甲申三百年祭〉》，从史料根据、学术观点、政治影响直至学风，基本对郭沫若及《甲申三百年祭》持全盘否定态度，引出诸多反驳意见。截至 1982 年底，发表文章三十余篇。王守稼、缪振鹏《〈甲申三百年祭〉及其在现代史学史上的地位》考述了《甲申三百年祭》写作、发表经过以及各方反映、产生的影响。顾诚《如何正确评价〈甲申三百年祭〉》更多的是从明末历史事实入手，批驳姚雪垠对《甲申三百年祭》的种种“不实

之词”。两篇论文从不同侧面对争论中涉及的主要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由姚雪垠“发难”的争论大体告终。

卜庆华著《郭沫若评传》是郭沫若离世后推出的第一本传记。书中分时期评述了包括考古、古文字、古籍整理在内的郭沫若史学成就与贡献，对于此后郭沫若传记、学术评传的撰写有着筌路蓝缕之功。

二

从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成立到1992年11月郭沫若100周年诞辰，郭沫若史学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成为郭沫若史学研究的重要阶段。

（一）对郭沫若史学所涉及问题的研究，包括了郭沫若各个时期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

此间，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与相关单位联合召开过两次重要的学术讨论会。一次是1985年10月在重庆召开的“郭沫若在重庆”学术讨论会。这是一次郭沫若研究的盛会，提交了相当数量的史学论文，并就一些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对《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的研究，对郭沫若先秦学术思想的考察，朝着逐步系统、深入的方向展开，提出了如何正确对待史学研究中“影射”现象等问题。之前，山东省郭沫若研究会、乐山郭沫若研究学会、重庆地区抗战文艺研究会分别举行了以“抗战时期的郭沫若”为题的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编辑出版了《抗战时期的郭沫若》，史学研究方面的论文以对先秦诸子的研究为主。“郭沫若在重庆”学术讨论会的另一成果是，“通过对郭沫若史学研究道路的讨论，大家感到可以探讨中国当代历史科学发展的趋势，并初步拟

定了“从郭沫若的史学研究谈当前史学的发展趋势”的课题，准备组织史学界进行一次专题讨论”。于是，便有了1986年6月在武汉召开的“郭沫若史学研究”讨论会，这是一次关于郭沫若史学的专门性学术讨论会。围绕主题提交论文20余篇，大部分编入《郭沫若史学研究》，作为“郭沫若研究系列”第一辑，由成都出版社出版。

郭沫若逝世10周年之际，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召开了一次“郭沫若在日本”的学术讨论会。遗憾的是，以“郭沫若在日本”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却没有郭沫若如何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开拓者、如何将古文字与古器物研究引入历史研究，在历史学、古文字学等领域作出划时代学术贡献的研究论文。史学组讨论中，有学者把郭沫若史学研究现状归纳为：分门别类研究多，综合研究少；孤立研究多，比较研究少；研究其著作多，研究其人少；纠缠具体观点多，研究其实际贡献少。认为应当从“大师”、“学派”等方面开阔视野，深入研究，并提出建议：1. 组织史学研究力量撰写《史学家郭沫若评传》，争取在郭沫若100周年诞辰之际问世；2. 每两年召开一次小型的史学讨论会；3. 《郭沫若研究》每两年出一辑史学研究专号。

成都出版社出版的“郭沫若研究系列”第一辑中，王锦厚《郭沫若学术论辩》是一本专就郭沫若学术研究中有关争议问题进行论辩的考证之作；《〈甲申三百年祭〉的风波》、《屈原研究的启示》、《〈李白与杜甫〉的得失》、《杜荃到底是不是郭沫若》都涉及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

1992年是郭沫若100周年诞辰，为纪念这位一代史学宗师，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郭沫若故居组织13位历史学者撰写了15个专题，经林甘泉、黄烈负责编辑成《郭沫若与中国史学》一

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为郭沫若史学研究的代表性论著。上篇七题,偏于综合研究,依次为才华卓著的一代史学宗师、早期的史学思想及其向唯物史观的转变、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与超越、西方文化的影响、传统考据学的批判继承、治史的个性特色、史剧与史学关系的探索;下篇八题,属于专题研究,依次为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历史人物研究、农民战争史研究、先秦诸子研究、甲骨文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先秦时代其他出土文物研究、成绩斐然的古籍整理。15个专题囊括了郭沫若史学研究的方方面面,系统、全面地评述了郭沫若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和郭沫若在中国历史学诸多领域的杰出贡献,提供了认识和了解郭沫若史学研究的丰富、生动的学术资料,反映了当时研究的最高水平。

纪念郭沫若100周年诞辰将郭沫若研究推向高潮,1992年全国各种报纸杂志发表的郭沫若史学研究的论文共50余篇。《郭沫若研究》第10辑为史学研究专辑,收入研究论文11篇,集中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沫若的史学研究方面,包括古籍整理、文物考古,并附录了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时在两次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就审阅《中国史稿》(奴隶社会部分)初稿致尹达的长篇书信。

(二) 系统考察郭沫若史学道路。

叶桂生、刘茂林《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刘茂林《抗战时期郭沫若对中国史学的苦心经营》,是最先系统考察郭沫若史学道路的论文。1985—1992年,谢保成连续发表三篇文章,勾勒出郭沫若三个时期所走史学道路的基本线索。在郭沫若100周年诞辰之际,叶桂生、谢保成合作完成《郭沫若的史学生涯》一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全书30万字,以郭沫若一生的史学活动为基本线索,分启蒙(1892—1913年)、转折(1914—1927年)、成长(1928—1937年)、发展(1937—1949

年)、攀登(1949—1966年)、晚年(1966—1978年)六章,“考察他一生的治史足迹,包括历史研究、古文字古器物、文物考古、古籍整理等方面的著述与活动,评说其成就与特征,并揭示时代和个性带给他的局限”。

郭沫若100周年诞辰之际,叶桂生、刘茂林等著《郭沫若新论》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分传记篇、文学篇、史学篇三大部分。其中史学篇七章,分别为:治史的足迹、古史分期的一派、先秦诸子百家说、历史人物论、古文字学研究的奥秘、考古文物面面观、古籍整理新评。纳入成都出版社出版“郭沫若研究系列”的《郭沫若纵横论》是一本综合性的论文集,史学方面有《郭沫若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的影响和作用》、《郭沫若与王国维》、《郭沫若的秦始皇研究》、《郭沫若史剧与史学关系研究》等文章。

三

从郭沫若100周年诞辰到20世纪末,郭沫若史学研究出现了新的趋势。

《郭沫若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出版,收入史学研究论文20余篇,透露出郭沫若史学研究的某些新苗头。一是对郭沫若史学著作进行重新考察,包括《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三部史学著作,50年代的三大史学工程,新发现的《商周古文字类纂》等;二是转向思想文化研究,考察其如何领导思想文化潮流及其儒学研究、孔子观等;三是进一步拓宽研究领域,如方志学、研究方法的特点与运用等;四是文化交往,如“甲骨四堂”比较研究、与胡适的关系等。

(一) 思想文化研究。

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发起过三次学术讨论会，都以“文化”为主题，成为郭沫若史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一次是“郭沫若与儒家文化”，一次是“郭沫若与东西方文化”，一次是“郭沫若与 20 世纪中国文化”。

1993 年 10 月在曲阜召开“郭沫若与儒家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结集为《郭沫若与儒家文化》，由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出版。文史两界专家集思广益，共同研讨郭沫若与儒家文化的关联，郭沫若与孔子，青少年时代郭沫若的尊孔，郭沫若的美学、人格学和风格学，并比较郭沫若与鲁迅对于孔子的认识，评述郭沫若的《驳〈说儒〉》等。

1997 年 10 月在成都举办“郭沫若与世界文化”国际性学术讨论会，论文结集为《郭沫若与东西方文化》，由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8 年出版。从历史研究角度考察这一问题，包括对郭沫若世界文化观的总体论述、郭沫若的先秦诸子研究及其世界文化观等，从哲学层面探讨郭沫若与现代生命哲学的关系，从政治角度探讨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给予其思想的影响等，都是带有跨学科性质的研究。

世纪之交的几年间，社会转型引发了对各类学术文化的新的思考，以“郭沫若研究与文化反思”、“郭沫若与 20 世纪中国思想文化”、“郭沫若与新世纪”为题召开了多次学术讨论会。2000 年 8 月在吉林长白山召开“郭沫若与 20 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学术讨论会。《郭沫若与 20 世纪中国文化》一书收录了上述多次学术讨论会的成果，由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2 年出版。除纵论郭沫若与 20 世纪中国文化的论文外，文史两界学者论述涉及的史学问题包括从 20 世纪三大思潮看郭沫若与中国思想文化、郭沫若史学研究特色、从社会历史演变审视“李杜并存”与“扬杜抑李”两种文化思潮、从五四评法看郭沫若的尊法反术、郭沫若与秦始皇、郭沫若与武训

批判等，抓住此间一些热点话题，显现出郭沫若研究的某些新貌。

1994年6月在广西举办“郭沫若与当代文化”学术讨论会，没有史学研究专家到会，但涉及儒学、巴蜀文化等论题。

（二）文化交往研究。

与世纪末总结20世纪学术文化密切相关，20世纪学术大师研究出现热潮。作为“20世纪学术大师交往系列”的《郭沫若交往的文化圈》一书，由林甘泉负责组织撰写，追述了郭沫若半个多世纪学术文化生涯中与19位文化精英的交往，书名定为《文坛史林风雨路——郭沫若交往的文化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其中，10位为文学艺术领域的名家（鲁迅、茅盾、郁达夫、成仿吾、田汉、老舍、阳翰笙、夏衍、傅抱石、焦菊隐），9位为史学、考古学领域的名家（胡适、陈寅恪、容庚、翦伯赞、侯外庐、吴晗、尹达、刘大年、夏鼐）。该书通过大师间的友情、论争和恩怨，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透露出他们各自不同的性格、气质和价值取向，反映了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社会思潮和文化取向。

（三）针对学术谎言的驳斥，涉及《十批判书》、郭沫若与陈寅恪的交往、《李白与杜甫》等。

这一时段内，出现了以谎言诋毁郭沫若、用“抄袭”贬低其学术的倾向。发其端者，皆为余英时。关于“郭沫若抄袭钱穆”，1954年8—9月在香港《人生》半月刊发表《郭沫若抄袭钱穆著作考——〈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说郭沫若《十批判书》抄袭钱穆《先秦诸子系年》。1991年在纪念钱穆专集《犹记风吹水上鳞》中收入《郭沫若抄袭钱穆著作考——〈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改副题为正题，“把过分轻佻刻薄的语句删除了。整体的内容，甚至风格，则一仍旧贯”。1992年在

香港《明报月刊》10月号发表《郭沫若的古史研究》，提出郭沫若犯了“严重的抄袭罪”。1994年12月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其《钱穆和中国文化》一书，收录了《郭沫若抄袭钱穆著作考——〈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于是，“郭沫若抄袭钱穆”的谎言便在内地流传开来。关于郭沫若使陈寅恪“直接受到政治压力”，1954年2月陈寅恪《论再生缘》自费油印完成，1958年余英时在《人生》杂志12月号发表《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1983年在香港《明报月刊》1、2月号发表《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谎称“郭沫若文未正式发表，不知究作何等语”，“陈先生《论再生缘》初稿完成之后必曾直接受到政治压力，要他‘删改’原文。郭沫若的‘辩难’，或与此有关，恐不尽关乎学术异同”。随后，在香港《明报月刊》相继发表《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陈寅恪晚年心境新证》，在《中国时报》发表《陈寅恪的‘欠砍头’诗文发微》，在台湾《联合报》发表《文史互证、显隐交融——谈怎样通解陈寅恪诗文中的‘古典’与‘今情’》等文。1995年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20年》出版，称上述“余英时近十万字的文章可以称得上是一轮排炮，在海外学术界引起相当反响”，强调这“十多万字的研究心得，剔出其浓烈的政治倾向，余英时对陈寅恪生平学术的理解大致不差”。由此，在内地引发“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郭沫若与“资产阶级史学代表”陈寅恪之间“龙虎斗”的议论。再一方面，则是散布郭沫若“扬李抑杜”是“攀援权声”，“迎合毛泽东好恶”。1988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金达凯《郭沫若总论》，说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是“迎合毛泽东好恶，违心之论”等。199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反思郭沫若》，除因袭余英时“郭沫若抄袭钱穆”说外，又编造谎言说冯家升“写过一篇研究李白身世的论文，后来，院长要看，派人取走之后，却

署上自己的大名发表了”。内地一些报刊和出版社刊登、出版其文章或著作，使得不明真相的读者人云亦云地跟着再“炒作”。

面对上述不实之词，海内外学者纷纷撰文进行驳斥。关于《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的考察，以方子舟《郭沫若抄袭了钱穆吗？》与翟清福、耿清珩《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评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两文为代表。方子舟以美国法庭认定抄袭时使用的铁证作为标准，指出：“统观余氏全文，可曾举出哪怕是一个这样的铁证？没有，一个也没有！反倒是《批判》对史料的摘引，往往更完整也正准确。”同时引用白寿彝1961年发表的《钱穆和考据学》一文中指责钱穆《系年》“剽窃”的文字，认为“钱穆在抄袭一事上，更加恶劣”，“读者应该是最有兴趣知道余氏是有何辩解的，然而余氏却不愿为恩师辩护”，只引述了“两位学者的私下议论”，“用来代表学术界的评价”。翟清福、耿清珩从郭沫若、钱穆两本书的征引材料入手，逐一进行核对，进行再互校，证明“余英时对《十批》和《系年》没有做过认真的研究，对两书引用的史料也未查阅过，有的问题自己没有弄懂，也不会断句，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摘引、甚至不惜篡改原文，以达到给郭沫若扣上‘抄袭’、‘缺乏学术道德’罪名的目的”。余英时认定，郭沫若抄袭钱穆最过硬的材料是所引明代王世贞《读书后》中有关秦始皇是否吕不韦私生子的考证。其实，郭、钱二人都没有见到《读书后》原书，都是转引自清人梁玉绳的《史记志疑》。钱穆转引《史记志疑》，把“读书后辩之曰”误改为“读书后辩说之曰”，郭沫若转引这段话，把“读书后”误作“读书后记”。余英时写《互校记》，连《史记志疑》也没有查看，竟跟着郭沫若把“读书后”误作“读书后记”。按照方子舟所说美国法庭认定抄袭时使用的标准，郭沫若怎么错的，余英时跟着怎么错，才

是真正犯下了“抄袭”罪呢！

围绕郭沫若与陈寅恪的交往，谢保成发表长篇文章《郭沫若与陈寅恪：“龙虎斗”与“马牛风”》（又名《郭沫若与陈寅恪交往考》），为多家报刊转载，分为未谋面时存异同、初次交往有波折、“厚今薄古”生枝节、评赏弹词两相逢、李白族属起辩争五个题目，系统考察了两位大师的基本情况以及他们在1949年以后谋面和未谋面的种种交往。文章以大量资料（包括郭沫若日记）弄清了“壬水庚金龙虎斗，郭聿陈瞽马牛风”这副对联的原委，考察了郭沫若公开发表的9篇关于《再生缘》的文章以及陈寅恪读后的反应，驳斥了余英时所说“郭沫若文未正式发表，不知究作何等语”而使陈寅恪“直接受到政治压力”的谎言，澄清了《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书中的诸多人云亦云。最后指出“陈寅恪是一位心地坦荡、性格耿直的学者，那种挖空心思在陈寅恪的诗文中发掘什么反对共产党的‘密码电报’，实际上是对陈寅恪形象的歪曲和糟蹋”，强调“应该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还历史本来面目，认认真真地阐释陈寅恪的学术思想！研究郭沫若者，应了解陈寅恪；知陈寅恪者，亦当了解郭沫若。”

方子舟、翟清福与耿清珩、谢保成所撰三篇文章，均收入《公正评价郭沫若》一书，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出版。

针对关于《李白与杜甫》一书的不实之词，反驳文章更多，以刘纳《重读〈李白与杜甫〉》、张清《对郭沫若“扬李抑杜”的一点考察》、谢保成《从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审视“李杜并称”与“扬杜抑李”两种文化思潮——兼论郭沫若的李杜研究》等文为代表。刘纳、张清撰写的两篇文章，收入《公正评价郭沫若》一书。《从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审视“李杜并称”与“扬杜抑李”两种文化思潮——兼论郭沫若的李杜研究》是迄今唯一一篇从社会历史

演变的角度来审视“李杜并称”与“扬杜抑李”两种文化思潮的论文，追述了盛唐至晚唐从“白也诗无敌”到“杜诗谓诗史”的变化，分析了宋至清初出现“千家注杜，一家注李”的原因以及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半个世纪离唐愈远、扬杜愈甚的现象，考察了郭沫若的一贯思想是喜欢李白、不甚喜欢杜甫，论述了《李白与杜甫》是郭沫若性情、理智交融的产物。最后认为：李白面对的是盛唐的繁荣，杜甫面对的是盛唐的灾难，自宋至清始终没有能够再现“大唐盛世”的那种辉煌，而是积贫积弱、社会矛盾加剧、专制集权加强、日趋闭关锁国，士人不得不转向现实，留意人生，视线自然集中在杜甫的“诗史”上。李白近道，杜甫近儒，在儒学、理学占思想文化统治地位的宋、元、明、清，扬杜抑李是历史的必然。李白的“摆去拘束”难以把握，杜甫的“属对律切”有章可循，而封建统治思想日趋僵化，科举考试日益程式化，必然形成“千家注杜”的局面。李白诗以浪漫色彩为主调，杜甫诗以现实色彩为基调，在现实主义创作思潮占主流的社会中，扬杜抑李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20世纪最后20来年，思想开放，人们在注重实效的同时又多了几许浪漫成分，李杜研究也就不再像前80年那种样子了。“扬杜抑李”倾向将会渐渐退出历史舞台，迎来的必然是李杜并称的局面。

至于说郭沫若的《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是抄袭冯家升的成果，《反思郭沫若》一书中有许多篇文章对所谓“谜团”进行解谜，终究没有弄清“谜团”谜在何处。《科学时报》1999年5月19日社会科学版发表文思博《“谜团”应该清楚了》一文，经过“细考”证明：郭沫若所用资料，来头比冯家升更有权威性，是郭沫若一向非常推崇的王国维，郭沫若受王国维的启发，却没有直接照抄王国维，根本不存在“郭沫若此文中包含冯家升研究成果”，所